



YIMENGGEMING
HUIYILU

伊盟革命回忆录

第六辑

中共伊盟盟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伊盟革命回忆录

第 六 辑

中共伊盟盟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一日·东胜

目 录

周仁山同志访问录·····	刘占宽、王庆富 (1)
回忆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开展 革命斗争的情况·····	金生华忆述 王庆富整理 (6)
回忆党在伊盟的民族政策及干部工作·····	李新民忆述 葛云鹏整理 (16)
人间正道是沧桑·····	许集山忆述 延光先整理 (61)
乌审事变始末 ·····	<u>张 竞 元</u> (73)
忠心为党，英灵永存·····	包 景 文 (87) ——忆白彦斯古朗同志
达旗剿匪的几个片断·····	图布升宝忆述 李志高整理 (98)
我人生路上的一点踪迹·····	秦 如忆述 贺文喜整理 (110)
难忘的岁月·····	郝凤岐忆述 全秉荣整理 (114)

- 回忆我党接待沙王的工作……………张 竞 元 (132)
- 开辟中滩……………边万富忆述
何知文整理 (136)
- 回忆木肯淖地区的革命斗争……………曹德义忆述
王志文整理 (153)
- 戎马生涯十三载……………田英秀忆述
张增明整理 (166)
- 在桃力民游击队的日子里……………赵德山忆述
张增明整理 (188)
- 八路军来到我们村……………张海则 杭凤荣忆述
张增明整理 (197)
- 活捉惯匪张世华……………林永飞忆述
杨虎祥整理 (201)
- 回忆在鄂托克旗战斗的二、三事……………田治满忆述
田自强整理 (205)

周仁山同志访问录

按：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上午，我办刘占宽、王庆富二同志走访了曾任伊盟工委副书记、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周仁山同志。周仁山同志在接见时讲述了他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九年在伊克昭盟开展革命斗争的一些重要史实，并对伊盟的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周仁山同志是我党优秀的民族工作者，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不幸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七日因病与世长辞。周仁山同志的逝世，是党和人民的损失，更是我盟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的重大损失。为了弥补这个损失，现将访问他时的记录整理出来，作为研究伊盟党史的一份珍贵资料。因未及请本人审阅，还望周仁山同志的战友们及周仁山同志的夫人黄静波同志指正。

一九四一年秋天，我由延安到了三边，组织上分配我到地委统战部任干事，统战部还有一个干事，姓朱，陕北人，部长是梁明德，广东人。不久，陕甘宁边区三边专署成立民族事务科，由蒙人赵诚任科长，我任副科长。

（一九四一年秋）何文鼎进攻三边时，中央派王震同志任作战总指挥，贺晋年同志任副总指挥。我带着一个蒙人，到鄂托克旗和乌审旗边界活动。那时三段地工委机关只有一间房子，工委

负责人是何广宽、田万生，还有个曹玉成是管杂务的。当时三段地工委和伊南游击司令章文轩的关系搞得比较僵。

二

我作为三边警备司令部的秘书（我在三边搞地下活动少，身份已公开，都知道是三边的秘书），带着警备司令贺晋年给鄂旗西官府和章文轩的信，还带了些酒、茶叶、布匹等礼品，先到鄂旗同西官府搞联络工作。那时，西官府在召皇滩有很大一片砖瓦房。我们和西官府接头后，他将信转给了章文轩，章文轩当时未予答复。后来，章文轩托西官府给我们捎话，让我们派人到什么地方会面。

一九四一年冬天，西北局（书记张闻天，秘书长王南，副秘书长贾拓夫）派赵通儒（原伊盟工委书记——记录者注）、我和王子义去阿拉庙。临走前贾拓夫嘱咐我们，对章文轩的工作要做到使他“明投曹操，暗投刘备”。我们到了阿拉庙后面三、四华里的吴巴什（和章文轩是亲戚）家里，让他转达章文轩，请他约时间会面。吴巴什老人对我们很热情，招待我们吃饭、住宿，都很周到。第二天章文轩来到吴家，我们对章说：“你的处境我们清楚，要团结抗日。”章提出要苟池、大池，我们说这个问题迟早会解决的，我们应首先建立双方的来往关系。按照我们来时高岗的指示，赵通儒提出要和章文轩结拜的问题，章文轩立即表示同意。王子义因当时的职务不够格，因而没让他参加。于是我们三人就结了拜，赵通儒为老大，章文轩是老二，我是老三。

那时弓文魁是国民党鄂旗党部书记长（以后是韩裕如——记录者注），我们和章建立关系后，凡国民党可以活动的地方，我们也都可以去活动。章文轩还答应保证我们的安全，但要求我们不要和国民党碰在一起。在这以后，我们在鄂托克旗的活动中逐

渐认识了马富纲、顾寿山、马良诚等同志。

此后，我们每次去阿拉庙，章文轩都要与我们见面，招待也很好。我们也按照他的要求，从不和国民党直接见面。有时章在前面招待国民党的人，在后面招待我们；有时在前面招待我们，在后面招待国民党的人。

从此以后，我们经常去阿拉庙、召皇西官府和王爷府，从未出过事。那时章是伊南游击司令，奇恩成是保安司令。一九四七年一月中旬奇恩成反共，三边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高峰和郭宝山（田万生回忆录里说郭任警三旅八团团长——记录者注）、李振海率一个骑兵团和一个步兵团，我和云北峰、韩戈鲁带游击队，去消灭奇恩成匪部。当时奇恩成正在乌替打麻将，一下就被我步兵团包围起来把他消灭了。我们在阿拉庙活动期间，马富纲、马良诚、顾寿山也跟我们来往多了，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国民党和日本人。

三

一九四三年，王世泰同志任三边地委书记，高峰同志任副书记，派我到三段地工作，我带了天宝、蒙特儿、李森（曾任内蒙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已离休）、云照光等同志到了鄂旗三段地，我任书记，田万生为委员，另外还有个委员。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阿拉庙起义时章文轩被搞死了，这件事引起西北局和三边地委的严重关切。西北局和三边地委要追查章文轩的死因，遂派赵通儒到三段地调查了解，我也亲自到阿拉庙进行调查。这件事的发生，与我党毫不相干，完全是他们内部搞的。到阿拉庙是赵通儒、我和王子义（翻译）三人去的，在章家招待我们的是吴巴什。我们追查章是怎么死的，有的含含糊糊说不清。章文轩对内部压得很厉害，马富纲、顾寿山恨章，是吴巴什

用裤带勒死的。你们带个信给田万生同志，请他回忆一下章文轩死的情况。有的回忆章文轩的死是我党授意的，这是一种误解，完全不对！说搞死章文轩，组织上意图我知道，我不知道！

四

（一九四五年春）赵通儒当了伊盟工委书记，赵被捕（一九四六年十月）后，工委分成伊东、伊西两个工委，我是伊西工委书记，韩戈鲁是鄂旗工委书记（先有一段时间是周仁山同志兼鄂旗工委书记——记录者注），杨经纬是乌审旗工委书记，李振华是乌审工委副书记。一九四八年（冬天——记录者注）李新民任乌审工委书记。第二次成立伊盟工委（指一九四七年四月成立的伊盟工委，应为第三次成立——记录者注），高增培任书记，我任副书记。有两个部队，即鄂托克大队和乌审大队（还有一大队——记录者注），开始叫蒙汉支队，以后叫伊盟支队，王悦丰任支队司令，高平、赵玉山任副司令，赵英任参谋长。部队先在吴旗整编，整编后活动分开了，但组织没分开。高增培带一、二个大队去了伊东，我和马富纲、马良诚、天宝带三大队留在伊西坚持斗争。马富纲是副司令，天宝是教导员，马良诚是大队长。

马良诚诚恳、直爽、开朗、勇敢。他牺牲我们也有责任。（一九四八年秋）我叫他在大石砣待一天就撤，他不撤，戴着大墨镜站在那儿，叫人家打死了。马良诚在武装斗争上是骨干、核心，入党较早，特别勇敢，伊西应突出马良诚（马富纲同志熟悉）。建议再收集一下马良诚的情况。马良诚牺牲后，部队很动摇，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马良诚和尔吉胡图（顾寿山）牺牲后，马富纲代理大队长。

顾寿山也比较突出。一九四七年春马鸿逵部队来，我和韩是今带骑兵撤到阿拉庙后边沙巴拉里等了两天，派人给顾寿山送了三次信，叫他撤出来，部队拉出几个算几个。他回信说没问题，还说：“老周你这么怕，你来我保护你。”记不清是在葫芦素淖还是在白泥井，我碰到马富纲带六、七个人，我叫他赶紧写信通知马良诚，马良诚半夜撤出来，带来二十多人。部队跟敌人接火打起来了，马良诚为保护马富纲做了工作。顾寿山精干、勇敢，但政治头脑太差。四王爷抓住顾寿山送给马鸿逵，马鸿逵又把他送给四王爷，死得很惨呵！

乌审旗应突出王悦丰，再就是萨格萨（石玉山）等。

伊盟应突出高增培。高增培同志忠厚，群众关系好。伊盟党的核心是高增培。

伊盟一段乌兰工作很艰苦。

韩是今和国今（现名郭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同志关于桃力民斗争的回忆有不一致的地方，请你们将两篇文章对照、核实一下。

我是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九年在伊盟工作过，共七年时间，主要在鄂托克、乌审，也曾派人到宁夏、榆林开展过工作。关于这段情况，吴占东、郝文广了解，巴雅尔（奇文祥）也知道些，周兴源在包头，他也知道些。马鸿逵的一个师曾派人送信叫周仁山、×××投降，我们将送信人扣起，部队撤出后把一个放了，有一个叫侦察排长周兴源枪毙了。对我的这段工作，云北峰、李新民、韩戈鲁也了解。

写回忆录要写革命精神，要注重事实。一定要实事求是，按事实办事，不要扩大事实，突出个人。关于我写回忆录有三点想法：第一，在伊盟时间短，不准备全写；第二，同志们来了解情况，我可以提供；第三，不准备请人代写。

刘占宽 王庆富整理 1985.4.19.

回忆在内蒙古伊克昭盟 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

金生华忆述

王庆富整理

早在二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就把少数民族问题作为革命的一个重大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一九三五年十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就十分重视开展内蒙古伊克昭盟的工作。同年十二月二十日，毛主席代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了《对内蒙古人民宣言》，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政府对内蒙古地区的残暴统治和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提出了将“井岳秀所占领的巴图湾与高石秀所占的区域及两个盐池，交还内蒙人民”的主张，规定了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政策，号召内蒙古人民不分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随着《宣言》的发表，党中央先后建立了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和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领导开展内蒙古地区和宁夏回族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受党的派遣，来到伊克昭盟鄂托克旗三段地和慕生发（关时键）等同志一道，组建中共鄂托克旗工作委员会的。我们的具体任务是，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开展鄂托克旗的建党工作、群众工作和武装斗争，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三七年初，党成立了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罗迈（李维汉）同志兼任主任，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也参加少数民族工委的领导工作。以后，少数民族工委又曾改为蒙古工委，高岗任主任，赵通儒任秘书长。

一九三六年六月，红军西征解放了定边和盐池。随之，中央在定边成立了蒙古工委，以便就近开展伊克昭盟地区的工作。接着，在西征军政治部主任刘晓同志关于“盐池应该坚决地、无条件地退还给蒙人”的正确指示下，中央蒙古工委和少数民族工委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将我党从马鸿逵手里夺回的北大池、苟池、敖包池退还给鄂托克旗。红军的这一措施，在伊克昭盟各阶层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九三六年七月中旬，高岗等率领陕北红军蒙汉骑兵游击队（队长齐廷珍、指导员杨勤生）解放了鄂托克旗的三段地、二道川。其时，我正在保安中央党校研究班学习，成仿吾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到伊克昭盟开展蒙古工作。我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离开中央党校，于同年十月来到刚刚解放了的三段地，到一九三七年九月我调离伊盟，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们主要开展了下列六项工作：

1. 抗日的宣传工作：

当时，伊克昭盟的蒙古人，特别是鄂托克旗的蒙古人，绝大多数对共产党和红军是不了解的。榆林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宁夏的马鸿逵，以及他们派到鄂旗的特务，给王公上层灌输的是共产党“共产共妻”，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党是打倒王爷，再斗喇嘛的”等等反动宣传，从而把共产党和红军形容得简直成了一群妖魔鬼怪。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争取上层、广泛联系中、下层，交

朋结友的方针，以赠送传单，召开群众会等方式，向他们宣传我党的《三五宣言》和民族政策，宣传红军长征的胜利，宣传红军是抗日的部队，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帮助蒙古人的等等事实。从而从道理上说服他们，感情上联络他们，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这样，就使他们逐步认识到国民党的宣传完全是一套骗人的鬼话。“七·七”事变后，我们又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三段地、二道川、阿拉庙等地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加之日寇的侵略铁蹄不断深入外患日益深重，因而使蒙人在“抗日保蒙”、“抗日救国”的问题上和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同时，我们用枪杆子作宣传，对那些坚决反共、破坏抗日的坏分子予以坚决的镇压，这也在鄂托克旗发生了很大的震动。

2. 党的政策的转变：

国民党政府自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别区改为行省后，一直对内蒙古推行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但因其国内外矛盾重重，“迭床架屋，政出多门”，因而对蒙措施也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这对我党贯彻民族政策、开展蒙古工作却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军初到三段地、二道川一带时，蒙民群众由于对党的政策不了解，加上国民党、王公贵族的反动宣传，不少蒙古同胞跑到草滩上、沙巴拉里躲了起来；汉人中，有的也把财物窖起来，把粮窖隐蔽起来，不敢和我军接近。其原因，是他们受土匪、反动军队的蹂躏坑害太深了。昔日那种牛马被抢，鸡羊被宰，妇女被侮……的惨景，在蒙古人民的心中留下的创伤太严重了。为了发动群众，改变对我军的认识，党在三段地、二道川一带开展了挖匪根（主要是反动地主武装）、斗恶霸运动，并将匪徒们掠夺的财物分给贫苦农牧民，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双十二西安事变后，我党由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转变到

联蒋抗日。根据党中央关于“民族上层分子，他们是欺压和剥削人民的统治阶级，但是蒋介石在国内推行大汉族主义，跟他们是有矛盾的，就当前来说，我们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亲日派势力。因此，在斗争的策略上，要善于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指示，我们在蒙地推行了不打土豪，不分田地和牛羊，不搞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党的政策的转变，民族政策的贯彻，团结了蒙古王公上层，建立了各阶层、各民族联合的革命统一战线。从而使我们在蒙地站稳了脚跟。

3.成立三段地牧民招待所：

根据中央少数民族工委的指示，我和慕生发、李占胜等同志一起，学定边牧民招待所的样子，在三段地也开办了牧民招待所，工作人员有慕生发、李占胜、周海则等同志。招待所开办后，经常接待蒙古上、中、下各阶层人士。他们来一次三、五人到十来人不等。他们一来，我们就向他们介绍陕北苏区的情况，阐述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借以促进了解和联络感情。这期间，除了许多普通牧民外，章文轩的管钱粮掌盖（外号二胖子）、米立克营长、西公爷等许多蒙古人士也纷纷到招待所来，和我们联络，建立关系。

4.建立和发展党组织：

一九三六年十月，我们正式建立了中共三段地工作委员会（即中共鄂托克旗工作委员会），中央少数民族工委指定我为书记，委员有慕生发、李占胜等。工委以牧民招待所的名义出现，积极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工委成立后，我将组织发展的具体工作交由慕生发同志分管，首批吸收的党员有当地农民高谦、王培章等。经过一个时期的组织发展，陆续建立起三段地、二道川、二段地、葫芦素淖四个党支部，计有党员二十多人。地下党员的发展，在鄂托克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除有少数叛党、自首、脱逃者外，大多数党员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有

的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5.建立抗日的群众组织：

一九三七年夏天，中共鄂托克旗工委领导蒙汉各族人民开展鄂西工作，成立了五个贫农分会，即漫水塘、洪山塘贫农分会；北梁、东壕贫农分会；马场井、报壕井贫农分会；达赖火场、亚麻赖口子、道尔计洼贫农分会；胡芦素淖、召皇口子贫农分会。其后又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三段地贫农总会和妇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七·七”事变后，我们将贫农总会改为三段地抗日救国联合会（亦称动员委员会），慕生发任主任。这些群众组织的成立及改建，适应了全面抗战的形势和统一战线的需要，并为动员蒙汉各族人民起来抗日，为八路军补充兵员、筹集粮草给养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6.建立游击队：

三段地工委成立后，我们深感没有一支武装力量不行。于是，我们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很快建立起一支游击队——三段地工委游击队，由阎占彪任队长，王万年任指导员。游击队在斗争中逐步扩大，很快由十几人发展到四十多人。那时三段地处在宁夏军阀马鸿逵和安边国民党部队的包围之中。因此，工委和游击队经常保持高度警惕，时刻加强岗哨，严防敌人偷袭。

这支游击队由于混进了一部分当地哥老会会员，成份复杂，组织不纯，因此敌人便阴谋利用这些分子策划内部叛变。一九三六年底，三段地哥老会趁我游击队尚未巩固之机，暗中串通游击队内部的几个班、排长，企图将队伍拉走，投靠宁夏马鸿逵。工委察觉后，一边做基本群众的工作，一边派人继续了解他们的活动，密切监视他们的动向。恰值这时，从定边来了十几个人，我们便趁机放出风声，说骑兵团随后就到。一听说骑兵团要来，叛徒们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惴惴不安，并密谋叛逃。我们根据已经

掌握的确实情况，在一天夜里叫来两个主要头头，当即将其镇压，并连夜将游击队拉到二段地，第二天又杀了两个，从而镇慑了动摇分子，坚定了大多数人的革命信心。同时也彻底粉碎了敌人策划的叛变阴谋，保住了这支四十多人的游击队。

二

在开辟伊盟地区的工作中，党对于蒙古民族内部的团结，也是十分注意的。

一九三六年秋，鄂托克旗和乌审旗的王公上层因边界问题发生了矛盾，遂兵戎相见，诉诸武力。战争进行了几个月后，乌审旗占了上风，军队攻进了鄂托克旗，直打到离阿拉庙四十多里的地方。同室操戈，自相残杀，给两旗的蒙古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我党中央对鄂、乌两个兄弟旗蒙古族内部发生的战争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当伊盟蒙古族牧民代表到延安参观学习时，毛主席亲自接见，并特别向他们讲解了团结抗日的重要性，指出兄弟阋于墙，必为外人所用的危险后果，让他们给王爷捎话，敦促他们停止战争，和平解决两旗纠纷。

遵照党中央关于迅速调解鄂、乌两旗冲突的指示，一九三七年三、四月，上级党派我到阿拉庙，和章文轩联系解决鄂、乌冲突问题。鄂旗保安司令章文轩，系鄂旗军、政实权人物。这时他手下有一营队伍，由米立克任营长，部队驻扎在阿拉庙一带。在鄂、乌战争中，鄂旗方面的指挥是章文轩，乌审旗方面则由纳顺德力格尔营长指挥作战。

临出发前，领导上对章文轩的情况作了分析，指示我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并给章文轩写了一封信，内容是劝他们立即停止战斗，以和谈协商的办法解决两旗纠纷（五十年代初

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作期间，西北局党史资料委员会派人来取走了这封信）。同时，赵通儒还画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二虎相斗，两败俱伤”的漫画，写了“鄂托和乌审，同是成吉思汗的子孙”等宣传标语及“鄂托和乌审本是兄弟旗，有事情就应该和平来商议。争地界打仗死伤的是自己人，日本鬼子来了谁也活不成”的歌词，统统捆成一捆，给我带上。然后找了个榆林边客胡××（外号胡麻子）给我当翻译，随我一同前往阿拉庙。

三、四月的鄂尔多斯草原，已经绽出一点嫩芽，远看草场已经呈现一层薄绿，使我想起了古人“草色遥看近却无”的优美诗句，胸中不禁泛起一派盎然春意。但想到中央的意图，上级党的布置，深感此行责任重大。我和胡翻译各骑一匹马，无暇饱尝草原的春光，只管策马扬鞭向前急驰，当天下午即到达阿拉庙。其时阿拉庙岗哨林立，戒备森严，沙巴拉里时有骑哨出入。我盘算两旗交战，司令部驻地当然应该加强警戒，也没放在心上。我俩到司令部附近下了马。奉命前来接待我们的是米立克营长，寒暄几句，就听米大声下令：“将骑马牵下去加喂草料！”我们遂将坐骑交两个勤务兵牵走。米立克营长把我们引进屋里，只见炕上有一张小炕桌，摆有一盘炒米和一盘饽尔稣（饼子），我上到里炕，胡翻译 圪蹴在炕沿上。屁股刚挨炕，就听米立克营长厉声命令：“倒茶！”声色颇觉不对。果然随着喊声，冲进来五、六个持枪蒙兵，挤满地下，一个个乌黑的枪口对准我俩。我大声责问：“这是干什么？”米说：“奉章司令命令，请你们出去，我们要搜身检查！”我泰然自若，和胡翻译走出屋外，脱下白茬老羊皮袄，让他们搜查一遍。我们来时未曾带枪，他们搜遍全身，一无所得。我遂把信件和一捆宣传画及标语交给米立克，请他送给章司令。米立克当即拿去向章文轩作了汇报。

章文轩原计划枪毙我们，其手下管钱粮的掌盖因早与我们有联系，他对章文轩说：“这两人不是刺客，倘是刺客，哪有不带

武器吗？自古道两国交兵（因章怀疑共产党支持乌审旗），不斩来使，还是放了他们为好，免得惹下红军，伤了和气。”米立克营长也劝章不要杀害我们。于是章反复看了少数民族工委的信件，觉得他二人说得有理，就将我俩衣服、马匹发还，让我们速即离开阿拉庙。

米立克出来后，我又向他陈明红军对解决鄂、乌冲突的诚意，让他转告章文轩司令。说罢即与胡翻译扳鞍上马，疾驰六千多里，一个奔子跑回三段地。胡翻译哪里经过这种场面？一路上担惊受怕唯恐遭到伏击，竟吓出一场大病，三、四个月后方得痊愈。最后他感到当红军风险太大，遂离开我们，仍旧当他的“边客”去了。

后来我们了解到，章文轩要杀害我们的原因有三条：1.国民党派往鄂旗的特务在章文轩面前造谣，说我们是红军派去的刺客，到阿拉庙的任务是刺杀章司令的；2.在此之前，高岗收编的杨猴小土匪部队发生哗变，并在鄂托克旗大肆抢掠。于是章文轩便误认为是红军抢劫了鄂旗；3.章文轩认为乌审旗跟红军早有来往，关系密切，乌审打鄂托克是红军在后面唆使的。我们的阿拉庙之行，对章文轩教育、启发很大，解除了他的许多误会。经我党多次工作，使他逐步改变了对红军和共产党的认识。与此同时，我党也给乌审旗方面做工作，劝他们停止冲突。在我党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后，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也派参议赵锦彪前来调处。他们于四月底到达乌审旗哈拉根图庙，于五月二日召集两旗的重要仕官及军队营长以上官员开会，商定十项解决办法，双方签字勘划争执地界，乌审旗将抢来的牛、羊、马匹等退还鄂托克旗。自此，双方遂化干戈为玉帛，再未发生武装冲突。

此后，章文轩对我党调停鄂、乌冲突深为感激，我党与章部的统一战线亦随之形成。除一九四〇年冬的苟池事件外，再未跟我党发生冲突。